

夏東元著

晚清洋務運動研究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蔡济生
封面设计 李文金
封面题字 顾廷龙
技术设计 黄汉庭

晚清洋务运动研究

夏东元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1.25 插页 5 字数 243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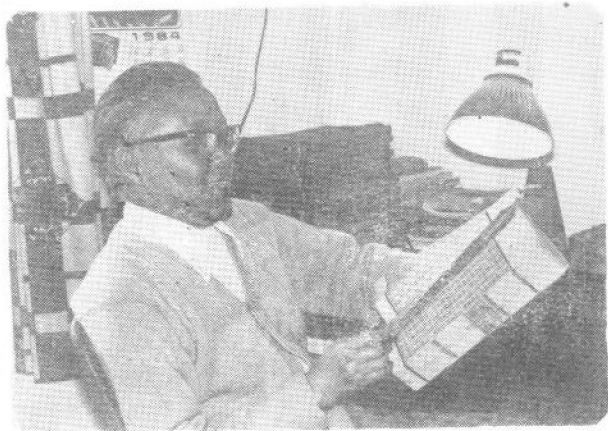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11118·184

(平装) 定价: 2.30 元



作者小传

夏东元，江苏省靖江县人，一九二一年生。青年时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对国学造诣较深。参加革命工作后，曾在山东大学（解放区）政治系学习，一九四六年毕业。随即长期从事政治理论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先后在滨海公学、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等理论课的教学。一九五六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期，发表过论文三十余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发表三十余万字文章外，所著《郑观应传》，颇得学术界重视，校编出版的《郑观应集》，影响亦较大。现正撰写《盛宣怀评传》和《洋务运动史》两书。

我和洋务运动史

——代前言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主要问题的看法，分歧最大的要算是洋务运动了。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前提下，评价高一些与低一些之分，对其中人物、事件等具体问题，由于观点不同，资料的掌握和运用不同等原因而分析理解有别而已。独有洋务运动，学者们对它的评价距离很大甚至是完全对立，例如，肯定者曰爱国，否定者曰卖国；褒之者称之为进步的运动，贬之者称之为反动的运动。由于大前提的对立，因而对于与洋务运动相关联的人物、事件的看法，也就不仅是一般的各异其说，而且有些还必然是南辕北辙！

然而，对于洋务运动，不管是肯定也好，否定也好，或是肯定与否定参半也好，作为历史学来说，非大力研究不可。这是因为，占八十年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近一半时间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并有所发展；旧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加速分化，新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启蒙的文化思想和旧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开始激烈交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等等。这些变化都与洋务运动有关；洋务运动对这些变化是起到

促进作用的。我之所以从事洋务运动的研究，主要是因为长期教学和工作中遇到上述这些问题牵涉到洋务运动，而逐渐意识到对它进行探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

我关于洋务运动研究的处女作，虽然是一九五八年一月发表的《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但对于洋务运动中一些问题的酝酿却远早于此时。这主要是马列主义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给予我的启示。

我到苏北、山东参加革命工作后，即对于理论学习兴趣很大，而对政治经济学更是如此。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在山东解放区一所干部学校教中国近百年史，在教学中，与另一同志合作编写了《中国近百年史》课本，课本虽简单，但通过编写却使我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过程中，我搞到了分上、下两册的《资本论》第一卷，如获至宝地读起来了。读《资本论》困难虽多，我还是坚持读下去。直至一九五五年的近十年工夫才断断续续地读完三卷。《资本论》不只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最好的哲学书，它那种史论的结合，逻辑的严密，至今还没有一本著作可以代替它。读了它，不仅思路开阔，对社会科学广阔领域中的问题的理解大有不同，对中国近代史也有了更多的想法。一九四八年进入城市后，由于工作需要，教过《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等理论课，其中《政治经济学》反复地教了多遍。长期专做理论工作，表面上脱离了中国近代史，实际上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理论上的造诣，使我逐渐意识到，过去所学所教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政治史，很多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不平等条约为什么是那么

些条款，它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关系如何？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依据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时候形成和怎样形成的？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政策所依据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性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衡？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他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反映客观规律到什么程度，他们为什么不能全面而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等等。这些都是从大的方面说的，至于同上述问题相关联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更多了：中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发生发展的？有何特点？中国自然经济破坏和阶级分化有何自己的特点？新的文化思想产生的特点是什么？等等。我带着一连串问题去重温中国近代史，感到很多不好解释的问题同经济史、思想史的研究不深入有关，而对上述那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都必须追溯到洋务运动那一段历史。对那段历史研究不好，不仅对当时很多现象解释不清，也影响到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乃至我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多问题的理解。因此，我于一九五六年重新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后不久，即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

研究洋务运动从那里下手？当然是经济史与思想史。经济史是洋务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不研究得较好，就不可能懂洋务运动史。但过去学术界对它研究太薄弱了，我决定在这里下工夫。思想史的研究也很薄弱。研究思想史必须研究人物，人物那么多，对洋务运动说哪几个人最关重要？我认为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是比较关键的。于是选他们三人为重点研究对象。这三人各有其特点和代表性。李鸿章其人是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的活动牵涉到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

教思想等各个方面；盛宣怀是洋务运动骨干，活动范围很广而主要是经济活动；郑观应则是买办出身的洋务企业经营家，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点是涉及面广，活动时间长，对他们进行探讨，可达到以点带动面，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扩大。

第一步研究经济，这也可以说发挥我的优势吧。首先遇到的是洋务军用工业性质问题。当时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封建性买办性极浓不带任何资本主义性。似乎是说，除多了一个买办性之外，同清政府入关以来所办军火工场的性质没有什么两样。我认为这关系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必须认真对待。于是运用《资本论》给予我的理论武器，阅读大量原始资料，阐述了洋务军用工业是封建性买办性带有资本主义性的近代企业，并肯定其有着进步的因素。这是我对洋务运动认识的出发点。接着不久，又发表了洋务民用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文，奠定了我对洋务运动有某些进步作用之看法的基调。同时对与资本主义相关连的自然经济破坏、阶级分化、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

一九六〇年后着手研究人物。上面讲的李、盛、郑三人齐头并进地研究而首先着重于李鸿章。这不仅因为这个人重要，而且资料也比较齐全，除已刊者外，上海图书馆藏有约五百万字的李鸿章未刊稿。我有幸成为它的抄件的第一位读者。一九六二年我写好《李鸿章传》约十五万字的未完稿。一九六三年政治运动较多，接着是“四清”和十年浩劫，这种情况，非但不容许我完成《李鸿章传》的未竟之功，且将“未完稿”连同资料卡片也被拿走至今片纸未回。

我没有气馁，《李鸿章传》不再重写了，盛宣怀和郑观应还是大有可为的。但有关盛宣怀的资料《愚斋存稿》，起自一八九六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盛宣怀未刊信稿》，只涉及一八九六年后断断续续的几段历史，至于一八九六年前几十年，资料很少，而这几十年对洋务运动史却是很重要的。我在这方面掌握了一些未刊材料，有条件对盛宣怀进行了初步系统的研究。

郑观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他不但影响到孙中山和康、梁等人，而且据《西行漫记》所载，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中，也曾说“非常喜欢”读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并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学术界知郑氏全貌者少，材料缺乏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得到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大力支持，提供给我数以千计的有关郑观应的未刊资料原件，因而终于写成了《郑观应传》一书，并发表了几篇论文。

在对人物的研究过程中，也结合对某些洋务企业进行研究，其中如轮船招商局就是我作为麻雀剖析的。

从经济、人物的研究，基本上达到了我预定的目标。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学术观点也不例外。我对洋务运动的看法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如前文所说，我在五十年代后期所发表的几篇关于洋务工业企业的文章，实际上已初步形成了：洋务运动的产生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却起了促进的作用的论点。然而，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严重的“左”的偏差，它也反映到学术领域，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批判。因此，我在一九六三年所写的关于洋务运动的文章，虽还有我固有观点的痕迹，但强调以政治路线为唯一标

准来衡量洋务运动，是不对的。

十年浩劫中，研究中断，但还是零星地不断地阅读一些理论和资料书。检讨过去的论点，认为研究历史应该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相结合，还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三年的观点正确些，比较实事求是些。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在《文汇报》发表的《再论洋务派》初步表达了我的看法，一九八〇年在《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发表的《洋务运动发展论》，系统地表达了我对洋务运动史的观点。这个观点最概括地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却撒动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b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民起义被镇压，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强，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洋务运动由制内为主转变为以御外为主，军事上大办海军海防和装备新式陆军以御外寇，经济上大办民用工业企业以与洋商争利；
C 但当八十年代资本主义有所发展需要变专制制度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以与它的发展相适应时，洋务官僚却仍然坚持封建专制的反动政治制度，从而违反了历史潮流而失败了。）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开始，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结束。）

我对洋务运动的上述看法，既不同于肯定论者所说的进步的运动，也不同于否定论者（包括所谓“两点论”者）所说的反动的运动，而是把洋务运动置于历史长河规律中从发展上评价它的。⁽¹⁾洋务运动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但“绿灯”的“电钮”在什么条件下撒动，那不是历史所注定的；它未能在鸦片战争林

则徐“御夷”中掀动，却在二十年后“两害取轻”中触发了。

(2) 从政治路线说，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当然是反动的，但却促进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迅速发生。在洋务运动发展中，从经济上抵制洋商军事上御外这二点说，路线上有所改善，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反动目的未变。因此，笼统地说洋务运动是反动的运动或者说进步的运动，都是欠妥的。我常常说，历史科学的发展是必然的，它主要取决于以下三条：（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二）资料不断丰富和运用资料的水平不断提高；（三）社会实践不断丰富。几十年来尤其是建国以来，学者们在历史学（包括洋务运动史）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学术上政治上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数十年来上述“三条”有了巨大的发展，对史学、洋务运动史观点的发展，是很自然的，正常的。未来还必将继续发展着。

洋务运动史好比一架机器，它由许多零部件所组成。我这本《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并不是一部专著，而是由我的代表性论文所组成，因此“零部件”不可能完整无缺。但也大体上反映了整体与部件之间的关系。全书共收论文十五篇，分为三组。

第一组《洋务运动发展论》、《论洋务派》、《再论洋务派》、《关于洋务派的阶级属性问题》、《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等五篇，属于总论性质，基本上反映我研究洋务运动的思想体系或总的看法。其中《论洋务派》一文是在一九六三年“左”倾思潮影响下写的，从全局看，与我的体系相左，本不宜编入，但由于此文一方面还保留有我固有观点的痕迹，另一方面，它提出了一些可取的新观点，代表了那时的水平，故仍收入。

第二组《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论清政府经营的近代民用工业的性质及其必然前途》、《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性质》、《论“齐价合同”》等四篇，着重对洋务企业的性质和经营活动进行剖析，说明洋务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组《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论盛宣怀》、《论盛宣怀与洋务企业》、《郑观应思想发展论》、《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等六篇，主要是关于人物思想的文章。这里须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关于李鸿章，我在六十年代初写了他早期、中期和后期的洋务思想三篇文章，只于一九六二年发表了早期洋务思想一篇，其余两篇在一九六三年后当然不可能发表，原稿早已不知去向。其二，《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越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但前者是紧接着关于郑观应的两篇文章，是顺理成章的。

书中论文起自一九五八年一月，迄于一九八二年十月，首尾相隔二十五年之久，它们各具有一些时代特征。为了保持原貌，除个别词句有所斟酌修改外，概不更动。

这本集子的问世，要感谢长期对我协助的薄芳同志。从五十年代以来我所积累的大量资料卡片，很多是她摘抄的；而这本书中资料核对工作是由她代为完成的。

夏东元

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DATE 1/7

目 录

我和洋务运动史

——代前言 ····· 1

第 一 部 分

洋务运动发展论 ····· 3

论洋务派 ····· 28

再论洋务派 ····· 56

关于洋务派的阶级属性问题 ····· 66

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 ····· 75

第 二 部 分

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 ····· 91

论清政府经营的近代民用工业的性质及其必然前途 · 127

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性质 ····· 160

论“齐价合同” ·····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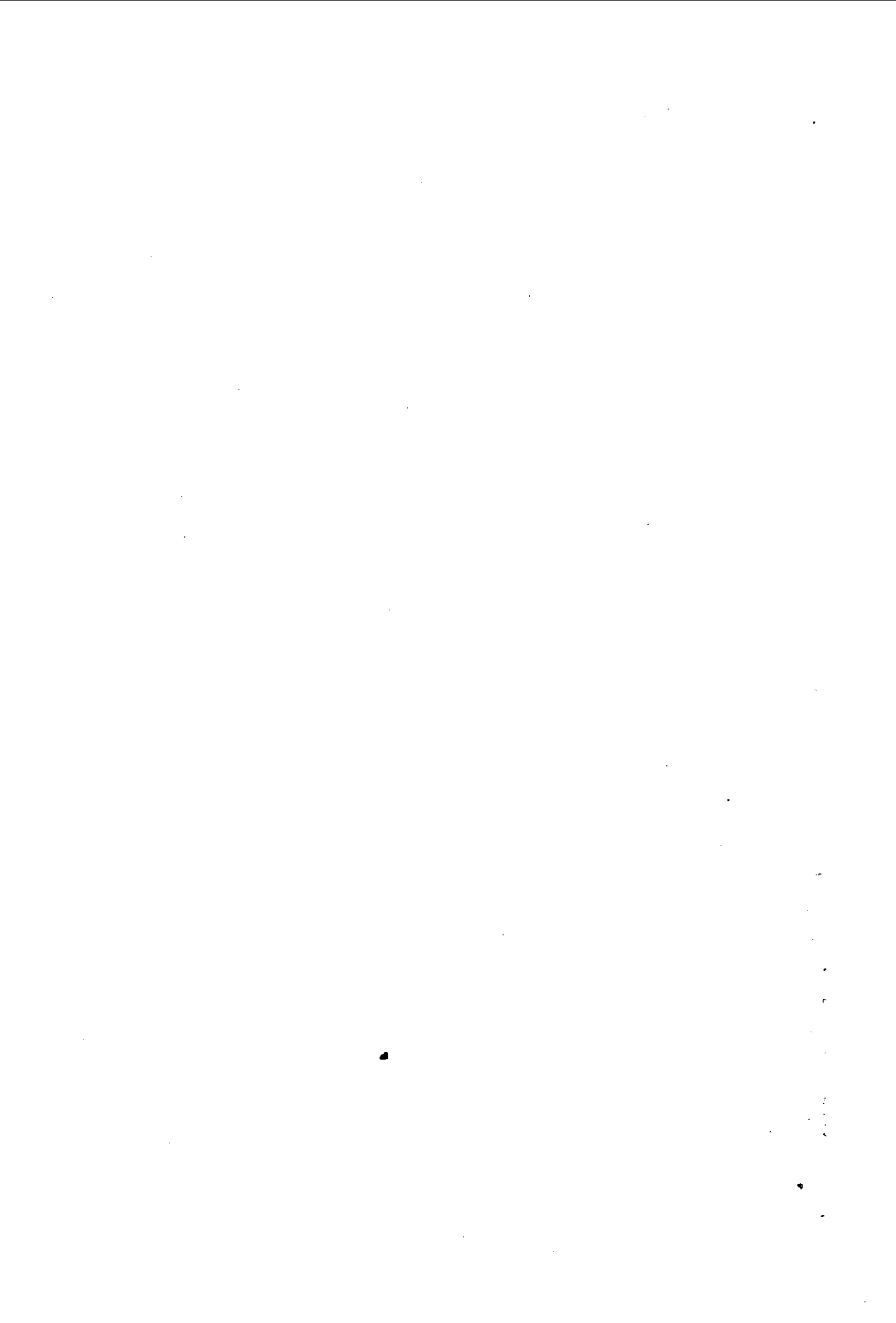
第 三 部 分

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 ····· 203

论盛宣怀	• • • • •	216
论盛宣怀与洋务企业	• • • • •	250
郑观应思想发展论	• • • • •	277
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	• • • • •	310
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	• • • • •	326
后 记	• • • • •	349



第 一 部 分



洋务运动发展论*

象所有事物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一样，洋务运动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各个事件的堆积，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对洋务运动是有规律可寻的。洋务运动既有规律可寻，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人物、事件、工厂企业等一切构成洋务运动这一整体的“零件”，都应放在规律中来加以评述。

一、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一提起洋务运动，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公式。确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虽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为人们所提出^①，但早于此几十年前，

* 我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洋务运动的文章。如果有与本文观点相冲突者，以本文为准。

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较早见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万国公报》中《救时策》一文。此文系沈毓桂以“南溪赘叟”署名发表。文中写道：“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口（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讲“中体西用”一语，则始见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所上《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章程片》中，原文是：“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各篇均简称《张集》）·奏议·卷四七页二二。

“中体西用”的思想不仅已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也是洋务派的基本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发端，还可以追溯到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在鸦片战争中所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中体西用”的思想雏型。为什么？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中学为体”，就是清王朝为首的封建主义统治秩序为体，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这个“体”。因此，具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人，就是站在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立场上，用新的有效的手段，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来保卫封建统治这个“体”。哪一种力量——外来侵略或人民革命——对这个“体”的威胁最大，具有这一思想体系的人就要用这新的手段对付谁。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是对付谁的呢？答复是，首先是对付对于清朝统治威胁最大的外国侵略者的。其标志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的提出，也就是说用西方“长技”来“制夷”以维护这个“体”。

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实行封闭式的统治，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无所知，妄自尊大地认为天朝是最完美无缺的。鸦片战争中的枪炮声，惊醒了统治者中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他们发现洋人的火炮威力很大，不是原始的弓箭刀矛所能抵敌的。林则徐从实践中认识到中西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他带总结地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林则徐在认识到中西火炮差距的基础上，并总结出战胜敌人的“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